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上海理论社科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家座谈会发言选登

编者按 日前,上海理论社科界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家座谈会。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上海理论社科界必须担负起的重大政治责任。为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积极做好研究阐释、决策咨询、宣传普及各项工作,本报今刊发4位专家学者发言。

抓好教育科技人才改革任务落实

■ 蒋传海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作出“三位一体”系统谋划,统筹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和今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阐述了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已有部署基础上,接续部署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并统一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深刻领会内在关系

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下,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的系统谋划,并对改革任务进行统筹部署,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创新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把握。

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共同支撑创新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发挥核心作用。教育是基础,就是教育要发挥立德树人的基础作用,为科技进步和人才发展提供知识基础、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科技是关键,就是科技要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关键作用,科技进步是推动教育发展和激发人才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动力。人才是根本,就是人才要发挥第一资源的根本作用,为推动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根本力量。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畅通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是要突出教育的先导性功能,不断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动力,以教育之强成就人才之强,赋能科技之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突出科技的战略地位,努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布局重大科研任务和发展高质量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有效结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突出人才的根本性作用,充分激发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创造活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人才队伍。

牢牢把握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进行具体部署,明确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点任务,着力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整体效能。

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方面,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完善立德树人机制,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改进育人方式,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教育公平。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提出要坚持“四个面向”,不断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新型举国

体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企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

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的平台。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机制,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发挥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向用人单位授权、为人才松绑。优化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认真抓好举措落实

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结合点,一定要把学习全会精神与推动高校自身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担当,从全会部署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重要任务中找准切入点、发力点,以更强的主动性、更务实的举措,抓好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一是围绕提升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能

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把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科学与技术等学科建成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改革与探索。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发挥自然科学、工程学科和人文社科多学科布局的优势,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

二是围绕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高水平的有组织科研,高质量推进国家实验室、教育部直属研究中心和基金委科学中心建设,以重大科技项目为牵引,集聚力量开展科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结合地方重大产业发展需求,不断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产业发展的能级。推进校企协同创新,探索和完善“企业出题、校企共研”的科研合作模式,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能。

三是围绕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立健全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一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深入实施“汇贤人才”计划,适当扩大教师队伍规模,注重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深化职称分类评价改革,创建多学科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准确把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 刘红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2023年6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赋予这一论断新的意蕴、新的举措。

“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依据至少有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再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探索性事业、宏伟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

正确处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同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党的领导能力与长期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更要要求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要求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战略思想、底线思维与领导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关键在人”,一是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从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看,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从严治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选拔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具有现代思维、现代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概括提出“20字好干部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并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

二是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聚天下英才而善之。国以才立,业以才兴;千秋伟业,人才为本。在新时代,“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体两翼”中的一翼。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战略。

三是“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关键在“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关键在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党的建设乃全党之事,既需要党中央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安排,也需要各级党组织层层落实责任,还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党内,只有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才能凝聚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在全国层面,毛泽东曾经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

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着力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做到与做好“两个维护”,又着力强调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如何“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决定》至少从六个方面作出具体要求与工作部署,即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加大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力度;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制。上述六方面致力于增强选人用人的公信力,有效避免片面地走“网上群众路线”而导致新型的脱离群众,有效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全体党员、干部、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党建研究院院长)

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 郑崇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文化领域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部署,这是基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和面临历史性变革作出的科学研判和整体谋划,为新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贯彻落实到全过程各方面

深入理解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的科学理论为总的方法论,融通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和大时代观,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到文化改革全过程各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源就在于独特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只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价值。从当前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来看,我

们面临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问题,以新的发展理念指引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卡点堵点,也只有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推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全方位创新,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治理体系。

增强有效性、针对性和精确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党的二十大提出整体文化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突出鲜明的问题导向,着力破除深层次制约性体制机制障碍,把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四个方面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具体来讲,就是要解决党的文化突破口的首要问题、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阻碍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文化惠民均衡高效实施的难点问题、国际传播的影响力问题等,以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为突破口,精准施策,着力破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增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举措的有效性、针对性和精确度。

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上,把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制度优越性,体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鲜明特点: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不断确立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二是高度重视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强调构建新的技术环境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既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同时又切实保障文化安全。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同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动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和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贯穿在改革的各环节各领域,把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作为改革成效的主要评价标准,积极营造健康的文化生态和活跃的文化环境。四是充分运用科学方法论,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以大文化观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一体化推进。在主流媒体改革、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文化遗产保护、网络综合治理等重点改革任务中,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都有非

常明确的要求,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

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始终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不断展现新气象新格。

当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核心任务。上海要大力推进文化领域首創性改革,以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上海文化品牌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上海文化资源高度集聚和高效配置的整体优势,加速全球文化要素在上海的集聚融合,在创新驱动、产业赋能中焕发新生,以做大做强影视创制、艺术品交易、演艺、电竞、旅游、体育、网络文化和创意设计等重点优势产业为牵引突破,大力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持续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为改革提供新的动能和创造新的空间。

四个发力点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总体定位是制度型开放,参照系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路径包括国内层面的自主开放、单边开放,以及国际层面的双边开放、区域性开放和多边开放,目标是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具体安排有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外贸体制。首先要注重政策协同,避免政策不一致;其次要完善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等的发展;最后要建设各类贸易平台,包括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集散分拨中心、国际物流枢纽中心等。二是改革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体制。首先,优化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要对标一流。其次,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增加鼓励类、缩减限制类,取消制造业外资利用限制,推动服务业外资利用有序开放。再次,促进外资国民待遇生命周期全覆盖。最后,提升外资和对外投资在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中的作用。三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要促进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形成全面开放格局。要强调功能分工,打造形式多样的开放高地。此外,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一带一路”机制。“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词是“共建”和“高质量”,要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涉及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要构建多层次平台建设,构建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同时,兼顾标志性项目和“小而美”项目。

三重挑战

在目前的国内国际环境下,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一是开放什么?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追求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贸易协定、贸易谈判越来越少,这给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了挑战。首先,开放缺少有效的参照系,更难对标和评估;其次,开放走向自主和内驱,取得的进展可能与贸易伙伴的期待不一致;最后,开放外部环境的拖累,开放的速度和效果可能不及预期。二是向谁开放?在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势头的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寻找对象国和伙伴方面也存在挑战。不少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前沿后撤,越来越难以成为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对象国和伙伴。同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有自由化和便利化,往往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单边开放,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并不能成为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效支撑。此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对全球化的质疑,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尤其是与中国贸易的看法,并给它们制造“选边站”的难题,撕裂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合作,也恶化地缘政治的安全。三是在贸易保护蔓延的环境下,高水平对外开放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收益。这主要表现在:贸易增速下滑,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速都呈收缩的态势;投资增速下滑,由于发达国家的政策限制,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的增速也趋于下降;贸易谈判放慢,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围绕贸易的谈判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频繁贸易摩擦。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发展

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是惠及全球的事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二是高水平对内开放不抱憾。受疫情“疤痕效应”的影响,不当的管制和限制还在一些领域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要盘活国内贸易,激活国内投资,不仅要增强国内投资者对国内市场的信心,同时也要让国际贸易伙伴相信中国市场有获利机会。开放和改革需要双向促进、双向奔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水平对内开放需要协同发力,以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为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全面深化改革

■ 罗长远